

论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姚 东

【摘要】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与邓小平推进改革的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习近平不仅全面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深化、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两者的改革思想有着较强的共性和相互联系性。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必须深入研究邓小平和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相互关系,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关键词】 邓小平;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6)04-0008-07

【作者简介】 姚东(1981—),男,安徽肥西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习近平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探索中,对一系列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不仅在改革的理论依据、改革的政治方向、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改革的外部推动力等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而且还在改革阶段论、改革策略论、改革任务论和改革目标论等方面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比较邓小平、习近平改革思想,对于总结历史经验,了解两者的一脉相承性,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

(一) 在改革的理论依据方面,强调要认识和尊重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的理论依据方面,习近平直接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是一种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定位决定了只有不断推进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邓小平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看准了、抓住了、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这个核心问题,这一历史定位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就向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这样的实际状况要求我们不断改革,也就是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②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这一系列科学论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总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改革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尽管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丝毫没有任何变化。而习近平的改革思想,始终也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而展开的。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④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⑤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重申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⑥也就是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切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基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来制定和实施的,而围绕这个国情推动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可以说,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是紧紧围绕和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的。

(二) 在改革的政治方向上要求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几十年革命、建设经验而形成的共识。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习近平领导的改革实践,始终贯穿着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共同政治方向。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面对各种错误思想,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旗帜鲜明地把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定地贯彻到改革实践中。1979年春,社会主义改革刚开始,邓小平就针对一些人散布的所谓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先进的言论,立场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把这一原则列为改革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国际上对我国改革的两种评价,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重申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对为什么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问题,邓小平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高度予以了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⑧改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只有建立在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保障上才能迸发出勃勃生机。在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⑩在这里,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本质界定。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将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否认社会主义,而是完善社会主义,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中国实践特色。在论述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⑪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习近平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阐述,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⑫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⑬

(三) 在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改革实践反复表明,能否深刻把握改革的基本规律,坚持正确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在这点上,无论是邓小平还是习近平都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视为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我国改革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是我们优越性的体现,他强调“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⑭“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⑮改革过程

中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在集中全党智慧、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愿望基础上作出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同时，邓小平还深刻阐述了改革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因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推进改革。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④在改革之初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还是城市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都是源自于群众的实践。“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⑤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受惠，让人民群众高兴。

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紧密结合新形势下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观点。他高度重视将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统一起来，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⑥。在党的领导下，明确指出：“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⑦对于改革该依靠谁的问题，他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路线是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根本路线，因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改革。“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⑧此外，习近平还提出在深化改革，依靠人民的过程中，要让人民对改革有获得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他指出，“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紧密依靠人民和服务人民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意，而在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则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两者在本质上的 consistency。

（四）在改革的外部推动力上坚持对外开放，要求以开放促改革深化

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也从时代的高度进一步继承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要求以开放来促改革的深化。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实现封闭状态下发展的任务。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不行的。先前的落后状态就是因为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⑩。在对改革和开放关系的认识上，邓小平也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⑪“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⑫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邓小平指出：“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⑬因此，在改革一开始，对外开放就被坚定地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也必须实现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在内的全面的开放，以开放来与世界接轨。通过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生产经验和管理方法，从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对外开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是习近平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全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势，在继承邓小平开放思想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当选总书记伊始，他就把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作为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在这里提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号召。他认为，开放也是改革，如果没有开放，改革就会行之不远。为了更好地实现改革攻坚，必须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呼应，我国的开放不是被动之举，而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不仅需要开放，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更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放，也就是说开放如果止步不前同样没有出路。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⑭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改革攻坚，必须在更深层次领域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⑮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放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引进来”的层面，而要更加注重“走出去”，我国企业要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中增强竞争力。此外，习近平还创造性地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思想，他指出，全人类虽然自然和制度差异明显，

但“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⑧。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进行了准确分析,为我国新时期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确立了互利共赢的思想基础。

二、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发展

(一) 在改革阶段论上的新发展

任何一种改革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习近平对邓小平的改革阶段论进行了发展,指出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启动和推行的改革,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⑨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⑩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这一紧迫任务展开的,发展经济依然是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所处的改革阶段明显不同于邓小平时期。1978年开始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GDP总量也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潜伏着一系列隐患和矛盾,比如城乡、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凸显,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党内腐败问题加剧,社会上的诚信缺失,市场上的道德失范日益严重,国际局势也日益复杂。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到改革的成效,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原先那种刺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变迁的原生动力,使得改革边际成本日益增加,边际收益日益降低。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出口红利等改革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对此,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识,2013年9月17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⑪而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我国已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这一阶段,这也是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处的改革阶段大不相同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是在面对这样的挑战下着力推进改革的,而要想获得持续发展的“红利”,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予以推进。

(二) 在改革策略论上的新发展

在改革过程中,习近平在改革策略上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既注重现实又着眼长远的改革方略和改革方法。他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⑫。同时强调,改革是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因此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必须在领导改革中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⑬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体现出了由易到难,自下而上的特点,因此具有一定的首创性和探索性。毋庸置疑,邓小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在当时符合渐进式改革的规律性要求。对此,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⑭在改革初期,由人民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进改革的策略可以使基层形成的经验得到更好推广,从而有利于改革的持续深入。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着力推行的改革与改革之初相比已大不相同,改革已经从“下水试航”进入“深水远航”阶段。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习近平也深谙改革策略对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改革中始终重视对改革策略和方式方法的规划,“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成为改革必须倚重的重要策略。

习近平指出,必须按照“顶层设计”的要求,处理和协调好区域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眼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它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

性。”^⑤在习近平看来，现阶段的顶层设计有利于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果固化下来，因此，既要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也要强调高瞻远瞩、整体谋划，以此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宏观思维加强顶层设计，也要鼓励和支持基层和地方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也就是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统一起来，在这方面，习近平尤其强调两者的辩证统一性，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⑥强调“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前进”。可以说习近平的改革思想反映了我国由生存型改革向发展型改革拓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和全局性改革。

（三）在改革任务论上的新发展

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实践来看，由于邓小平和习近平改革所处的阶段不同，因此，解决的历史任务还是有明显不同的。应当说，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新路，在起步时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和艰难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多数人的思想还沉浸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突然提出一个“改革”的命题，且必须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前提，自然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所以，意识形态和统一思想认识，也就成了邓小平推行改革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任务。当时，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利益纠缠的因素并不是很多。那时党内外改革阵营的力量是强大的，也并没有形成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虽然期间也有过一些小曲折，如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夕，曾一度出现了对改革的质疑和一些反复，但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这些质疑就归于平息。

然而，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失衡、贫富差距加大、腐败日益严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等一系列挑战。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方面遇到的改革阻力更大。显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可以犹豫和等一等的余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的难度已经不比之前，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论断。因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意识到目前我国处于新常态的典型发展特征，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在2012年12月刚刚接任总书记伊始，习近平就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⑦。为了推进改革，习近平形成了“两个半程”的思想，他指出：“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⑧“两个半程”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推进改革的难度。习近平明确意识到，全面深化改革是场硬仗，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任务，因此处理起来格外艰巨，比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也是之前未曾遇到过和提出过的，这些新提法新观点也是随着改革难度的不断增大而提出的新任务。既然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那么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情绪是不可取的，习近平也认为只有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不断推进改革持续深化。

（四）在改革目标论上的新发展

习近平在改革目标论上也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改革是一种手段，它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1987年5月会见美籍华人李远哲、李政道时，邓小平就指出：“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赶上。”^⑨邓小平通过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实现“解决人民温饱”、实现小康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因为只有先实现这个初步目标，然后才能谈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三步走”是立足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层面的。他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⑩。对于制度，他也指出，可能还需要有30年的时间，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才能得以形成。

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目标的思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定为改革总目标所要实现的蓝图，因此，习近平在新的历史阶段将邓小平的改革目标推向了更深层次和更高阶段。习近平强调：“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在这个总目标中,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实现路径。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将改革的方向与改革的路径实现了统一^②。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领域上涵盖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五大体系,在治理主体上包括了党的执政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

同时,改革总目标也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融入其中。改革总目标的确立就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因此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梦的提出和改革总目标的确立,使得我们党对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路线的认识更加清晰了,聚焦点、着力点也更为明确了,在此认识基础上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取得成功。因此,这些新思想新论断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目标思想的发展、整合和升华。

三、余论

习近平改革思想与邓小平改革思想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中继承是前提,发展是主体。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正确观点,是习近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总结,为习近平改革思想提供了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立足于实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总结,形成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全新的改革思想。另外,我们必须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一是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习近平直接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改革营养。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③因此,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分析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范围,我们对邓小平、习近平改革思想的评价,也应持这样的态度,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邓小平之后,习近平领导的改革之所以深入人心、深得民心,有其历史必然性,这除了得益于习近平本人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极丰富的经验阅历外,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实践留下的宝贵经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后,除了短暂的中央军委工作时间,习近平长期都在地方从事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和地方主政经验,切身经历过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并目睹了改革所带来的伟大成就,这使他能够得以深刻地洞察改革的魅力并坚定地认识到必须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因此,在他领导的改革开始,就坚决地进行全面深化,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可以说,习近平个人直接从邓小平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改革营养,这也使得他领导的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继续向前。

二是改革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改革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如果离开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离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就不可能产生改革思想。列宁曾经说过:“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成长出来的。”^④虽然新时期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但改革思想不仅是他个人的创造性思想劳动,更是在凝聚人民力量,反映全党智慧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因此,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造和思想升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是形成习近平改革思想最深厚的基础。同时,习近平的改革思想也是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集体智慧,习近平的改革思想不是个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间的互动,个体交流互动行为产生的新智慧。另外,集体智慧的形成离不开个体智慧的贡献。善于集中全党智慧,同时也离不开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作用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的个人创造性理论创新对于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②③⑦⑩⑭⑮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265、252、225、373、256、326、78、98-99、256、117、134、370-371、372、277、89页。

- ④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 ⑤⑬⑭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 ⑧⑨⑯⑰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231、368、342页。
- ⑱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 ⑲⑳㉑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8、26页。
- ㉒㉓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
- ㉔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于《求是》2014年第1期。
- ㉕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
- ㉖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年9月16日。
- ㉗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 ㉘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 ㉙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 ㉚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 ㉜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2日。
- ㉝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9页。
- ㉞ 赵凌云、苏娜：《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十个重要论点》，载于《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
- 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 ㊱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责任编辑 王建国]

Xi Jinping'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o the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Yao Dong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is in the same strain as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promoting reform. Xi Jinping not only inherits the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in an all-round way, but also enriches, deepens and develops the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e reform thought of them have relatively strong generality and mutual link. In the current key stage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and Xi Jinping must be investigated in depth,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push forward the socialist reform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Xi Jinping; Overall Deepen Reform;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